

李輝

秋白茫茫

秋白茫茫

李輝



书边草丛书

秋 白 茫 茫

李 辉 著

*

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邮政编码:300020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天津市津美胶印厂印刷

*

850×1092毫米 32开 7.125印张 4插页 128千字

1996年11月第1版

199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100

ISBN 7-5309-2551-2

I·85

定价:10.70元



李辉，1956年10月出生于湖北随县（今随州市）。1974年高中毕业后到山区茶场插队。1977年年底考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1982年初到《北京晚报》工作，1987年调《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至今。已出版《巴金论稿》（与陈思和合作）、《萧乾传》、《刘尊棋传》、《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等专著和传记，出版《人地书》、《人生扫描》、《人在天地间——瑞典印象》等随笔集，翻译出版小说《看风景的房间》和散文集《枯季思絮》。1994年以来，在《收获》杂志开办随笔专栏“沧桑看云”，1996年开始在《新民晚报》副刊开办“静听回声”随笔专栏。近年来主编“金蔷薇随笔丛书”20种，参与策划“火凤凰文库”的编辑出版。

总序

于纷繁万象、嘈杂人生之中，眼下读书又成为一种景观，或者说是一种热潮，总是件好事。但在物欲膨胀、知识贬值、文化沙化、书籍也可以制作得花里胡哨犹如时髦服装的当今，读书和出版读书之类的书籍，也可以成为一种流行的时髦。

我们编的这一套“书边草”读书丛书，不想追逐这种时髦。

我们期冀作者读书理书、书林掇英、笔底钩沉之中，让心和着书页一起跳动，让书有着灵动的生命气息，让我们自己的生命因书的生命滋养得以扩充和延长。

我们期冀读者读到的不是浮文弱质、花拳绣腿、时令果蔬般的书话文章，而能心有所动、思有所悟，或荡心涤虑、或洗心静气、或清心清火、或会心会意。

我们同时期冀与其他出版的读书书籍有所不同，拥有着自己一份与众不同的特色。这一份特色主要表现在不是惯常见到的那种五色杂陈读书文章的汇集，而是每一本书集中一个领域

和主题，决无思有旁骛、斜枝横倚；不求五光十色，但求心系一处。

“书边草”丛书第一辑五册，特意约请五位中青年作家，或心游万仞纵横中国现代文人的文脉心曲；或取心析骨解剖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的荣枯得失；或怀珠韞玉涉猎外国文学家的爱恨大潮；或朝花夕拾聆听西方古典音乐的华彩乐章；或探本溯源追踪世界流行歌坛的波动轨迹……五位作家对各自的领域和主题都有各自多年的关注和研究，因此，五本书不是一时的即兴之作，而是多年读书的结晶。

读书，难能暴饮暴食，长期的积累，悄悄的消化，与书为友，身心相伴，白雪红炉、黄卷青灯、绿茗紫烟中，一次次默默的交融和心神之间的对话，方才能使得读书的心得落花流水，蔚为文章；方才能使得读书的文章积沙成塔，聚腋成裘，集成各自一束小书，共五册奉献在读者的面前。虽各成一体，独立成行，且写法各异，样式不拘，或疑或怨、或激或愤，或探颐索隐、或钩深致远……却都是融评于书，寄情于思。五册书集中一起，可形成如篮球场上的一支队伍般的阵势，腾挪跳跃，攻防交叉，姿态互补，色彩纷呈；多几分活泼，也多几分相互的呼应和交融。

读书的文章，有了情趣，不是那么正襟危坐、学究气十足，人云亦云，或自视清高用来唬人的行当。读书，便也成了你我可以共同拥有的

一种境界。

的确，读书不是去游览胜地，满足于我们的观光；读书不是逛超级市场，满足于我们的物欲。读书，是寻找一块洁净的宿营地，能安置我们的灵魂；是寻找一方明亮清澈的夜空，让我们的梦能毫无顾忌地尽情飞翔。

过去常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其实，书中有的是我们的心和精神。我们能够拥有的一切，不是要向书中去索取什么，而是要向书中掏出我们内心里的一些什么。应该说，“书边草”第一辑五册书，是向书中，也是向读者掏出了一些作者内心世界真诚的思考、疑问、发现和收获。这就使得这套丛书不仅具有自己的特点，给予读者不同侧面的知识，而且具有了一定的向书同时也是向这个世界向自己叩问的带有心问和天问式的深度，以及温馨而湿润的气息。那气息，来自书中，更来自心灵。

希望读者读到这套丛书不会失望，而会喜欢。也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我们将继续把“书边草”丛书的下一辑编下去。我们希望“书边草”的草丛丰富茂盛。

我们希望更多的读者和作者走进这片清新湿润的书丛。

肖复兴

1996年6月于北京

目 录

总序 肖复兴

碑石

——关于吴晗的随感 //1

书生累

——关于邓拓的随感 //32

旧梦重温时

——关于“五七干校”的随感 //64

清明时节

——关于赵树理的随感 //93

秋白茫茫

——关于这个人的絮语 //122

平和,或者不安分

——追思沈从文先生 //142

与夏衍谈周扬 //154

他们眼中的周扬 //169

尚情无我

——关于梁漱溟的随感 //191

在黑白灰的世界里

——吴冠中印象 //201

后记 //217

碑 石

——关于吴晗的随感

我有一个北京朋友，住在东厂胡同。

这里要算市中心的中心了，周围颇有些值得经常走走的地方。从胡同北边出去，穿过一条窄窄的胡同，便到了中国美术馆。由西往东，出胡同口，马路对面是北京人艺和首都剧场，南边一点儿，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大楼和门市部，而往北走几步，过一个十字路口，便是老北京著名的隆福寺。隆福寺街上一个现在看来很寒酸的中国书店，这些年来，还真让我买到过一些很喜爱的旧书。东厂胡同的胡同东口，还有中国科学院情报中心，过去也是读书人和学者们常常光顾的地方，那里所收藏的图书，颇有些奇货，特别是一些外文期刊，甚至比大的图书馆还要齐全。

走在这样一条被文化团团环绕着的胡同，有时确实有一种安静和舒心的感觉。这当然还是十年以前的印象。

最初走进东厂胡同是在什么时候，我已记不太



清楚了，应该是在大学毕业来到北京后不久。开始我并没有在意这个胡同的称呼，虽然听人说这里就是明代有名的特务机构“东厂”的所在地，但除了有一种新奇之外，我似乎对走在这条胡同里并没有过多的历史想象，或者别的什么特别感觉。一幢幢新起的楼房，已经取代了老房子，只有少量斑驳陈旧的旧式屋檐，仿佛还残存着悠远的影子。那时，我当然没有寻旧的兴致，我的兴趣是在“五四”新文学方面，对与巴金、萧乾、沈从文等文人有关的胡同，我注意得较多，譬如萧乾度过少年生活的九道弯，沈从文住过的达子营，巴金、靳以他们创办《文学季刊》时住过的三座门大街，还有梁思成、林徽因居住过的总布胡同，我都曾不止一次地去踏访过。

是吴晗和他的文章，让我突然对这个胡同产生了兴趣。

大约十年前，为撰写萧乾传，我走进了科学院情报中心的图书馆，去查阅 30 年代的《大公报》。在沈从文和萧乾编辑的文学副刊上，我寻找着他们当年的踪影。在翻阅泛黄的报纸时，《大公报》的《艺术周刊》和《史地周刊》，也不时引起我的兴趣。就是这样的情况下，我在 1934 年年底的一期《史地周刊》上，读到了吴晗的论文《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

因为吴晗在“文革”中的遭际，也因为凑巧我就坐在当年的东厂所在地，看到这样一个题目，我便有了一种强烈的阅读欲望。于是，尽管我的兴趣不在史



学,但还是把本来会匆匆而过的目光挽留住,读起吴晗的文章。文章我读得并不仔细,但我觉得好像这样一次匆匆的浏览,使我对吴晗多了一些了解,也对遥远时光里的东厂胡同,有了些许具体的印象。

许多考证和论述,读后都不大能记起,但吴晗所讲述的一个故事,我却从来没有忘记过:天启年间,有四个平民深夜里在密室喝酒谈心,喝至酒兴大发时,其中一人突然开口大骂宦官——东厂的头领魏忠贤。其余三人听了吓得不敢出声。还不等那人的骂声结束,就有东厂的探子冲进来,把四人捉去,并在魏忠贤面前把那位醉后大骂的人剥了皮。过后,给另外三人赏钱放还,这一突发的惨状,把三人吓得变疯。这是一个令人恐怖的故事,吴晗选择它来说明东厂的淫威。

那天从图书馆出来,走到东厂胡同路口,目光顺着长长的胡同延伸,因吴晗的文章,我对那遥远的年代的感受似乎深切了许多。我想象着,当年为撰写这篇关于东厂的论文,吴晗一定不止一次走进这条胡同。那时的胡同,想必还保留着明清时代的风貌,他缓缓而行,在历史的陈迹中沉思。最近,读陈白尘的《牛棚日记》,上面记载说,“文革”初期史学界一次批判中宣部领导的大会在东厂胡同召开,陪斗人员中便有吴晗。我想,这该是他最后一次来到这个胡同。

因为这样一些缘故,东厂胡同成了我所难忘的几个胡同中的一个。



不知为什么，一进入明史研究的领域，青年吴晗就把目光注视在冤案上。在关于东厂的文章之前，他便发表了研究明代最大的文字狱胡惟庸党案的长篇论文《胡惟庸党案考》（《燕京学报》，1934年6月）。

胡惟庸党案是明代初叶的最大的党狱，前后十四年，一时功臣宿将诛夷殆尽，前后达四万余人。按照朱元璋罗织的罪名，胡惟庸的最大罪过是和倭寇勾结，阴谋谋反等。但吴晗在经过细致考证和研究之后发现，这完全是身为皇帝的朱元璋，为了铲除精干而专横的丞相胡惟庸所制造的一个冤案，从而为朱氏后代坐稳江山铺平道路。吴晗这样写道：“而胡案的组织过程，根据当时的公私记载，很明显地摆露在我们的目前。在胡案初起时胡氏的罪状只是擅权植党，这条文拿来杀胡惟庸有余，要用以牵蔓诸功勋宿将却未免小题大做。在事实上有替他制造罪状的必要。明代的大患是南倭北虏，人臣的大罪是结党谋叛，于是明太祖和他的秘书们便代替胡氏设想，巧为造作……”

研究这个冤案、写下上面这段话的吴晗，那一年只有25岁。

对青年吴晗来说，胡惟庸党案的研究，表面上看，考证与辨析能力的训练，也许大于对冤案的情感投入。因为对于胡惟庸这个朱元璋的宰相，吴晗并没有好感，他用明人诸书所记中的“枭猾阴险专权树党”这样几个字，来概括胡的品格，可见一斑。

他更感兴趣的，想来并不是胡惟庸个人，而是因



胡而蒙受惨祸的数以万计的功臣和文人，也就是他所说的“知识分子”。在开始对胡惟庸案产生疑惑的时候，吴晗 1933 年春节在旧书摊上购到一本《碧血录》。这本书记载着明朝天启年间，东林党的一些知名人士被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冤杀的史实。我相信，是这样一些东林党人的悲剧，让吴晗花费更多的气力，写出了他年轻时的力作。

他是青年。青年应该是拥有激情拥有热血的一代。他们对人世间的一切不平事，不管历史久远或者新近，都容易感受到强烈刺激，也最容易诱发他们去追寻，去研究，并在论说这样一些事情的过程中，获得心灵的丰富。

所有不平事中，历史冤案对于年轻学人，可能是最有诱惑力的课题。冤案必然是悲剧，而且浓缩得无比沉重，不能不注视它，却又不愿触及它。它总是以一种复杂而奇怪的状态，让古往今来的许多人在它的周围徘徊。难以言说的起因，大起大落的曲折，意想不到的结局，所有悲剧因素，都能构成一部大书。

是悲剧，就有了震撼力；是悲剧，就能让青年人对历史的好奇，变为深沉的追寻，从而对生命的体验，便多了一些内容，对历史的拷问，也多了一层悲凉。

有了对东林党人的同情和敬意，有了对文字狱的憎恨，有了对生与死的忧虑，吴晗写于 40 年代的那本《朱元璋传》，才始终贯穿着悲切与苍凉。



在《朱元璋传》中吴晗花费最多笔墨的是对文字狱的叙述。他对做皇帝后的朱元璋的刻画，全是围绕这一点展开。他曾用文学笔墨，生动地描写了朱元璋对文人的杀戮：“网罗布置好了，包围圈逐渐缩小了。苍鹰在天上盘旋，猎犬在追逐，一片号角声，呐喊声，呼鹰唤狗声，已入网的文人一个个断脰破胸，呻吟在血泊中。在网外圈外的在战栗，在恐惧，在逃避，在伪装。”

不过，写得最精彩的还是对朱元璋之所以大兴文字狱的性格分析。传记的最后一节是《晚年的悲哀》，他这样描绘出朱元璋“高处不胜寒”的精神状态：“母族绝后，妻族也死绝了。到文正被杀后，诸子幼弱，基业还未稳定，孤零零一个人，高高在上，找遍周围，没有一个人可以寄托心腹的，得撑持着，时刻警戒着，提心吊胆，不让别人暗算。正如驶着独木船，水把独木船冲得团团转，几十年到不了岸，看着水是敌人，礁石是敌人，连天空飞的乌鸦也是敌人，谁都要害他，都在讥笑他，讽刺他。从得了大权，做了皇帝之后，害了高度的紧张病，猜疑病，恐惧病。”在书写这样的词句时，年轻吴晗的心，一定揪得很紧很紧，他在为几百年前的那些蒙难的文人们叹息。

年轻吴晗便是以这样的姿势走进了明史研究，不，应该说他以这种方式开始了与历史的拥抱。历史加深他对人的认识与理解，历史让他感觉到生命的沉重。

这是他留给我们的唯一一部历史传记，早年吴



晗所有的学识、热情、勇气、激愤、深沉，都浓缩在这部传记中，当时还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把朱元璋的性格刻画得如此透彻。看得出来，他很看重自己的这部作品，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不断地修改它，重写它。不过他的修改一般被认为是失败之举。随着身份和地位的变化，随着环境的变化，他一次又一次将传记的文学性、批判性消解。读1964年最后一次重写本，我们几乎再也见不到早年吴晗的身影了，他的那些因年轻而激发出来的对文字狱的激愤、敏感、犀利不再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上面所引述的片断及其类似描述几乎都荡然无存。如果把年轻吴晗和老年吴晗放在一起审视的话，我们会因为彼此之间的巨大差异而感慨万分。吴晗本人是否也会产生同样的感叹，我们无法知道。

当年欣喜地购到《碧血录》时，吴晗是以敬重的心情回望着那些东林党人的影子。他们被魏忠贤杀害，都死得冤屈而悲惨，《碧血录》中收集的就逮诗、狱中血书、绝笔、自谱等内容，在他面前铺展开一幅幅历史的惨状。阅读这样的文字，一个历史研究者，只要他不是冷静到极点的智者，就不能不为之动容。在友人记忆中总是充满激情的吴晗，当年就是这样。他得到这本《碧血录》，感受最为深切的，当然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学者获得珍贵史料后的喜悦，而是作为一个热血青年，作为一个现实参与性极为强烈的学者，对生与死的忧虑。

他在读完《碧血录》之后，当即在该书的末页上



写了这样几句话：“读完此书，胸中不知是甜是辣，因想及自己将来如何死，若死在床上则未免太笨拙，最好是自己作一主意，想一洒脱干净死法，活得不耐烦，便撒手告别，岂不快哉！”

这样的忧虑之中，显然还带着年轻人特有的单纯。每个人未来的人生走向，生与死的交叉与变换，其实远不是个人所能想象和设计的。

吴晗尤其如此。

他写出上面那段话是在 1933 年的 2 月，差不多到半个世纪之后，人们才在他的遗物中读到它。这时，吴晗早已在“文革”初期因为《海瑞罢官》的冤案而死于狱中。是谁第一个读到这段话，我不知道，想必他会怔怔地呆立在那里，默默无语。

胡适算得上吴晗的恩师。是胡适，年轻的吴晗才选择了明史研究，从而确定了自己一生的学业。他的建树，他的荣耀，他后来的悲剧，都是从这里起步。

1930 年在上海中国公学念书的吴晗（当时叫吴春晗），给担任校长的胡适写信求教，开始他与胡适的交往。他所写的学年论文《西汉经济状况》，颇获胡适赏识，后来胡适把吴晗推荐给清华大学史学系主任蒋廷黻，使因为数学只考零分而不得入北京大学的吴晗，得以进入清华大学学习。从那之后，吴晗便在胡适的指导下，开始了明史研究。

读最近出版的《吴晗自传书信文集》（苏双碧主编，中国人事出版社），看到了吴晗胡适 30 年代的通